

中国海关历史学术研究丛书



赫德日记

——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ROBERT HART AND CHINA'S EARLY MODERNIZATION:
HIS JOURNALS, 1863-1866

【美】凯瑟琳·F·布鲁纳
约翰·K·费正清
理查德·J·司马富

编
译

【中】陈 绛

中国海关出版社

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赫德日记(1863—1866)

HEDE YU ZHONGGUO ZAOQI XIANDAIHUA
HEDE RIJI

[美]理查德·J·司马富
约 翰·K·费正清 编
凯瑟琳·F·布鲁纳

[中]陈 绛 译

中国海潮出版社
2005年10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赫德日记:1863~1866/
(英)赫德著;陈绛译. —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5. 10
ISBN 7-80165-157-X

I. 赫… II. ①赫… ②陈…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25479号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赫德日记(1863—1866)

[美] 理查德·J·司马富 约翰·K·费正清 凯瑟琳·F·布鲁纳 编
[中] 陈 绛 译

选题策划:高 烽

责任编辑:高 烽

中国海关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9层 100013)

北京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1230mm 1/32开 印张:26.375

字数:565千字 印数:1~3000册

ISBN-7-80165-157-X 定价:48元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3-4465

图编部电话:(010)85271833-653

发行部电话:(010)85271610

海关版图书,印装有错误可随时退换

本 卷 献 给 文 祥

1818—1876 年

满族高官文祥是清朝领导层中在 1860 年同北京英法入侵者议和并于 1861 年推动清朝中兴的重要人物。作为恭亲王领导下的军机处及其下设处理外国事务的专门机构总理衙门的主要官员,文祥是赫德在逐步建设海关时打交道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满人。他征求赫德的意见,重视他的报告,而且转而也影响了赫德。

两人为了维护英国—清朝谅解而共同工作。在 19 世纪 60 年代,这一谅解包括外国支持满族皇朝镇压叛乱者及默许发展对外联系和贸易。

文祥在他的时代是一位现代化倡导者,历史学家对此可能有所争议。他的背景似乎相当传统。他既是正统的学者,又是军事领导人。他成为一位北京的权威人物,其突出的条件在于他对清朝事业的极端忠诚。

文祥生于满洲南部辽阳一个满族正红旗的家庭。他于 1840 年在北京通过乡试,1845 年中进士。他在京师派任各种不同工作,1855 年赏给三品,1858 年 40 岁时出任军机大臣。他是一位操守廉洁、勤劳奉公的官员,不偏不倚,才智轶伦。我们尤其敬重他同赫德相处的技巧。他们两人相互影响,孰轻孰重,尚有待确定。

致 谢

xi

杰拉尔德·E·邦克 (Gerald E. Bunker) 最初将赫德日记制成录音磁带，使他几乎堪称我们编辑组的第四位成员。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戈登·惠勒 (Gordon Wheeler) 一直给予始终不懈的帮助。赫德用他自己的威妥玛式之前的拉丁字母拼音写出中文词语，戴维斯加州大学刘广京教授特别帮助我们解决了其中若干可能的含义。有关附录三的信函，我们感谢香港大学副校长王赓武和冼玉仪。承蒙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秦梅 (音, Mei Ching) 和中日文图书馆蒂莫西·E·康纳 (Timothy E. Connor) 文献目录方面的帮助，琼·希尔 (Joan Hill) 编辑方面持续不断的帮助，南希·德普图拉 (Nancy Deptula) 在职责要求之外的财政帮助，以及弗洛伦斯·特雷费森 (Florence Trefethen) 在哈佛出版本书出色的编务安排，对此统致谢意。我们感谢哈佛东亚研究理事会 (the Harvard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全美人文基金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以及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 (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美国哲学学会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和哈佛大学出版社不同形式的资助。

司马富
费正清
布鲁纳

编辑说明

我们力求日记完全按照赫德所写印行，不做删改，括号和文字下面的横线原样保留，后者常用以表示特别强调，而不是表示要用斜体字。有一两个次要之处，因赫德手写难以甚至无法辨认，为了避免给读者造成混乱，在某些情况下，不得不做例外处理。

我们在每则日记前列入年、月、日，例如，1864年1月1日，而赫德常常只写“27日星期五”，或“10月9日”。赫德日记含有星期几时，我们也将其包括在内。

如果赫德在文中只写汉字词语的英文拼音，我们用括号加入我们“最适当猜测”的译文——当然，除非从上下文看得出意义清晰，或赫德自己对词语已做出翻译或解释。直接译文（如果我们比较肯定它的音译）用引号表示。同它相当的威妥玛—翟理思式音译尽量包括在注释中。这样，如果赫德在文中写 *keuen*，我们正确的写法如次：*... keuen [权]...*，然后在该行或段末注中补充：*keuen: ch'üan*，必要时接着写出进一步解释。^{*} 如果我们未能明了赫德全部或部分音译，则在文中用方括号加入问号，并试图尽可能在注释中估计其含义。

如果个人姓名或称衔（不论一般尊称如 *ta-jin* [大人]，或实指尊称如 *footae* [抚台]）同时出现（如 *Teen Tetuh* 或 *Pwan tajin*），注释中的说明做“*Teen Tetuh*: 田兴恕提督”（如果我们知道其全名）或“*Pwan tajin*: 潘大人”（如果我们不知道其全名）。许多尊称如 *ta-jin*（大人）频繁出现，每次出现文中时，

^{*} 中译本仅保留赫德日记中原有的拼音（如“*keuen*”），回译成中文“权”，编者的拼音（如“*ch'üan*”）从略。——译者

在注释中一一译出其含义，便显得没有必要。

如果文中只出现称衔（如 *Leang Kwan Tsung-tuh* [两广总督]），则用方括号译出其含义（如 *Leang Kwan Tsung-tuh* [Governor General of Liang Kwang]），并以相当的威妥玛—翟理斯式音译置于注释末（即：*Leang Kwang Tsung-tuh; Liang-kuang tsang-tu*）。^{*}

文中汉字，我们用方括号注明并加英文拼音表示：“[汉字 *ch'eng-kou* (城口)]”，日期不加拼音，因而它并无歧义。因而：“the 1st day of the 5th month of the 4th year of the T'ung-chih reign, 做[汉字]同治四年五月初一日”。

注释中，称衔和尊称用斜体字（如 *fu-t'ai* [抚台]、*tsung-tu* [总督]、*ta-jen* [大人]等），但机构、地名、人名等不用斜体字。

* 原编者所作称衔（如“总督”）的英文含义和音译，中译本均从略。——译者

赫德爵士在 19 世纪中国的经历,不论作为个人在远方突出成功的故事,还是作为佐证中国对外关系的记录,随着岁月流逝,愈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我们在 1986 年出版的《步入中国清廷仕途——赫德日记(1854—1863)》开始叙述;现在以 1863 年至 1866 年的日记将其继续下去。它还是 1975 年出版费正清、凯瑟琳·F·布鲁纳和伊丽莎白·麦克劳德·马西森编的前此著作《总税务司在北京:赫德中国海关信函集,1868—1907》的进一步延续。把焦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不是将视野缩小,将对这个人不断扩大的联系范围、他的工作才干、他的目标、他的成功和失败等方方面面,有深入的了解。

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的序言中,我们稍为详细地解释了赫德日记怎样引起我们的注意。扼要地重述一下,日记——为数 77 卷,涵盖赫德在中国的全部岁月——是由其曾孙、已故罗伯特·哈特爵士留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后者于 1970 年去世,没有子嗣。1971 年夏间,几位与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者前往贝尔法斯特读到日记,但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资料数量庞大,而且赫德笔迹难辨日益增多——,决定不能将其编入《总税务司在北京》,此书将赫德同他的伦敦代理人金登干的大量通信分为两卷重刊,并加以注解。

赫德日记就这样在女王大学图书馆束之高阁,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杰拉尔德·邦克博士发表了在中国研究领域的哈佛历史学博士论文,携眷移居贝尔法斯特,入医学院。邦克博士在业余时间着眼于最终写成一种赫德传记,开始对日记进行调查研究。作为预备步骤,他开始朗读赫德从 1854 年到 1866 年的日记,将它录入使用电池的录音机,并将录音磁带送交凯瑟琳·布鲁纳,还原

xvi 成文字。遗憾的是,录音机的效果极不稳定,尽管文字记录内容引人好奇,但是最后证明它派不上用场:有疑问的朗读和不清晰的字太多,中文词语几乎无法辨认。

到1978年,邦克博士的医学事业使他从赫德日记脱身,莱斯特大学的司马富教授应邀参加编辑组。他刚出版《雇佣军与官员:19世纪中国常胜军》一书,这部著作以19世纪60年代上海中外关系的具体环境和中国在追求军事“自强”中雇佣外国人才的一般问题为中心。司马富对清代价值观、制度和礼仪持续不断的兴趣,表现在他1983年的著作《中国文化遗产:清代,1644—1912》中。这个兴趣进一步吸引他去调查研究赫德作为一个中国官员的早期事业。

司马富教授以美国哲学学会和哈佛大学的资助,三次访问女王大学图书馆。他在那里将布鲁纳的打字稿同原始日记加以比较,做了大量订正,增加了赫德当时用过的汉字,并且查阅了赫德藏品中其他研究资料,包括赫德来往信函、照片、清朝官员赠送的卷轴、书籍、斌椿日记,以及其他种种中国文献。日记中有一些表面上难解的字,他描摹下来,供大家一同仔细辨认——至今有些仍然徒劳。于是赫德1854—1863年最初10年的日记未遗失的部分于1986年出版。我们现在从1863年末开始,增加了1864—1866年这随后重要的三年。

目前这一卷在多大程度上是第一卷的续编?它是怎样开始探讨新的课题呢?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入乡问俗,在熟悉社会风情。环境垂青于进步;它们给他时间观察,注意别人——特别是中国人——的治理方式,而最重要的是让他成熟起来。在那一卷末,我们看到他28岁便身居负有重任的职位,握有对于19世纪大多看做“进步”——我们现在通称“现代化”——的发展的潜在权力。这两个概念在19世纪60年代都没有相当的中文。中国的“现代化者”只知道为了应对它的内部和外部挑战,需要变革,而西方提供了某些技术方面、也许甚至制度方面

的有利条件。现代化变革,和改革不同,它采用了外来的判断标准。 [xvii]

我们在这部书中强调了现代化主题,因为赫德 1863—1866 年的日记显示,他在中国这一曲折进程的早期阶段,起过重大的作用。他在这个时期的作用远远超过他早先支持诸如我们在《步入中国清廷仕途》曾较为详细地讨论过那注定失败的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之类的现代化项目。在 1863 年末接受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任命后,赫德成为他的总税务司前任李泰国所永远无法做到的——清朝中央政府亲密可靠的顾问。结果是,赫德在其漫长生涯的其余岁月,是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西方人。例如,清代作者陈炽在 19 世纪 90 年代评论,赫德握有政治大权,他的建议在朝廷广为传布,“中外大臣皆尊而信之”。*

赫德从 1863 年到 1866 年这一时期的经历,证明对他后来的成功至关重要。他作为总税务司,徜徉于中国官场的密谈角落——最初只是试探性地,从内部学到了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而且当他小心翼翼地顺利走过以清朝官僚为一方、外国外交官和商人为另一方之间的通道时,他开始获得前所未有的更大的信任,前所未有的更宽广的眼光。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除了支持西方科学技术形式的“进步”,他在海关税务司署内部开创制度变革,甚至鼓吹中国行政管理其他领域的改革。赫德这样做时,成为中国人追求“富强”的积极的伙伴——追求“富强”同样是支持现今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动力。

不过,赫德日记不仅仅使人们了解他作为一个现代化者的成就。日记还揭示了许多关于清朝官僚机构的内部运作,展现了这个机构所配备的许多不同层次的人们——尤其是最高层的人们。日记从独有优越的角度写作,告诉我们许多同时代大多数中国或西方著作所没有的关于 19 世纪 60 年代初期高级官员私下的想

* 《陈炽集》,“庸书(税司)”,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96 页。——译者

xviii

法和个人性格。它们当然远比总税务司保持经常接触的任何一个主要京官的私人著作详细得多。赫德在同总理衙门大臣(其中有三人兼任军机大臣)坦率而且常常是机密的谈话中,听到许多政治上的小道消息,他出于职责习惯,把它们记入日记。他同总署章京非正式的谈话,也令人大开眼界,他巡视条约口岸,同各省主要官员及其下属阶段性的交谈,同样如此。

没有什么逃得过赫德的注意,他的惊人的记忆力保证了他将其观察载入他的一页页日记中。赫德以非凡的客观性和高度的文化敏感性——至少对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说来如此——向我们指出清代官僚政治中人性的一面:它的官员的弱点和长处;他们个性的怪诞和特异的信仰;他们的恐惧和不安;他们的派系争斗。但是,如果赫德是用近镜头去看他的满族和汉族同僚,那么,他在审视自己和他的西方熟人时,就一丝不苟了。他的日记充满着自我发现和自我分析的揭露,以及对他的管理方式和社会生活的洞察力。他还向我们提供了对于在中国的各个不同层次的外国外交官和其他西方旅居者的许多评价。

赫德日记提供了关于19世纪60年代中外关系错综复杂的脆弱的结构特别有价值的记录。作为一名多国的海关管理的首脑——到1864年,海关夸称其雇员来自英国、美国、法国和普鲁士,还有中国籍监督及其他低级工作人员——总税务司署在北京外国外交官和清政府中树立了忠诚、廉洁、可靠和高效率的不可动摇的声誉。西方和中国官员同样将他看做他们最亲密的知心人。他从而卷入了中外之间历次发生重要的外交问题,以及许多较为次要的争端。赫德作为沟通中国和西方观点的桥梁,其意义因总税务司署参与了广泛的活动而更加扩大,因他既对中国的利益、也对他所认为西方“文明”的积极贡献都抱有同情而更加明显。

为了对赫德的见解和成就做出正确的评价,我们自然应当从审视他的19世纪环境开始。

目 录

vii

致谢	(xi)
编辑说明	(xiii)
序	(xv)
第一章 中国历史上的赫德	(1)
赫德生遇其时	(6)
1864 年上海:英国 - 清朝伙伴关系	(25)
第二章 日记:1863 年 12 月 6 日 ~ 1864 年 5 月 15 日	(51)
第三章 1864 年北京:建立总税务司的地位	(124)
总理衙门下的总税务司署	(125)
总税务司治辖下的海关	(142)
第四章 日记:1864 年 6 月 1 日 ~ 1864 年 10 月 25 日 ..	(162)
第五章 工作中的赫德:行政管理面面观	(258)
为海关发展筹措资金	(260)
巡视南方口岸	(266)
上海行政管理问题	(276)
长江口岸和赫德返回北京	(281)
第六章 日记:1864 年 10 月 26 日 ~ 1865 年 6 月 18 日	(288)
第七章 英国 - 清朝改革措施	(345)
中兴改革方案	(347)
赫德《局外旁观论》和中国的反应	(359)
第八章 日记:1865 年 7 月 2 日 ~ 1866 年 3 月 2 日	(372)
第九章 1866 年欧洲之旅	(450)

斌椿使团	(451)
赫德的婚姻	(465)
第十章 日记:1866年3月7日~1866年8月7日	(474)
viii 第十一章 视点与假说	(520)
作为中介的赫德	(520)
中国国内变革	(522)
改革建议的由来和发展	(526)
赫德的影响——1869年《阿礼国协约》	(529)
海关与帝国主义	(535)
附录一 外人在海关的职位	(538)
附录二 赫德致包腊信函	(541)
附录三 赫德致赫丝特·简·布莱登信函	(547)
附录四 税收季度报表	(565)
注释	(568)
参考文献	(701)
词汇/索引	(728)
译后记	(821)

图 表

ix

图

- | | |
|------------------------------|-------------|
| 1. 1855 年上海部分示意图 | (26) |
| 2. 1863 ~ 1864 年李鸿章和戈登作战地区 | (38) |
| 3. 北京示意图 | (128 ~ 129) |
| 4. 条约口岸体系的最后形成 | (143) |
| 5. 19 世纪 60 年代天津至北京路线 | (246 ~ 247) |
| 6. 1864 ~ 1865 年赫德巡视条约口岸所至城市 | (259) |

表

- | | |
|-------------------------------|-------------|
| 1. 1863 ~ 1864 年清代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人事表 | (131 ~ 132) |
| 2. 税收季度报表 (译文见附录四) | (263) |
| 3. 外人在海关的职位 (附录一) | (537) |

照片

- | | |
|-------------|-------|
| 福州城内栉次鳞比 | 内封 |
| 旗昌洋行 | (11) |
| 李鸿章 | (40) |
| 旗昌洋行“湖广”号轮船 | (78) |
| 文祥 | (133) |
| 身着中国服式的戈登将军 | (243) |

北京马车	(247)
香港威灵顿街	(267)
北京内城城垣前门	(346)
北京胡同	(349)
恭亲王, 1860年11月4日于北京	(353)
斌椿使团在斯德哥尔摩, 1866年	(462)
赫德夫人赫西特·简·哈特与赫德	(468)

第一章

1

中国历史上的赫德

现在有谁会想到旅行乘马车，照明点蜡烛，铺路用石子呢？我们时代已知的事，没有留存到下一个时代，便会很快被忘却。从 1842 年到 1943 年整整一个世纪，外国人是在他们自己法律的特殊保护下，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这些法律由他们本国领事执行。这种所谓治外法权的保护，是外国人在中国半殖民地生活的一个特征。他可以盯着街头大铁钉钉牢斩下的土匪首级，而用不着担心自己的脖子。那是一个外国统治中国的时代。今天，中国已经在中外关系中取得国家平等（而且偶尔还居于优势），在以后时代，只有费力想象，才能够回想起 19 世纪是什么样子。西方闯入者在中华帝国晚期和民国初期获得这样特殊的地位，是怎样发生的呢？

现代科学技术爆炸性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处在它的支配之下，我们无需在此一一缕述。同我们有关的是它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为了从世界的背景了解中国，让我们从发端于 19 世纪下半叶工业欧洲在世界范围扩张的叙述开始。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例如以 1870 ~ 1871 年意大利和德国的统一为标志，是同欧洲海外殖民主义扩张一起发生的。帝国主义大国分割了非洲和东南亚。印度在 1858 年叛乱结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后，为英帝国所统治，“印度部”是作为它的地方行政机构一个职能部门而设立起来。与此同时，日本的统一（1868 年）

和随后的现代化，导致它于 1895 年战胜中国，并且开始了对台湾的殖民统治（1895~1945）。与此类似，美国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内战后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促进了 1898 年后它在菲律宾取得世所公认的殖民统治。工业-商业民族向世界上技术比较落后的地区扩张，国内民族主义和海外殖民主义成为这个扩张时代的特点。来自大西洋社会的基督教传教士大胆向殖民的民族解释，这种通常采取暴力的扩张是上帝不可思议的手段。对于那些理性多于信仰的人们说来，他们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认为各国自然都为着适者生存而奋斗。你可以看到它就展现在你面前。

在这一背景下，赫德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开始了他的海关生涯。这个国家并不是单一的民族，但是学者精英的培养教育，使它在文化上互相认同，而且在北京统治下政治统一，使它不可能成为欧洲的一个殖民地。其结果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半殖民主义。1644 年满族入侵者的后裔将继续在北京统治，一直到 1912 年。西式武器帮助他们忠诚的汉族将领在 1873 年前制服了 19 世纪中叶的几次叛乱，此后直到 1900 年，进一步防止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缔约强国、特别是英国海军炮舰的到来和巡弋，同时促进了对外贸易所必需的国内和平。由于条约制度不仅允许在沿海口岸，而且也允许在内河，尤其在长江口岸进行对外贸易，外国在中国南方航道上的军事力量便具有渗透性的战略影响。清皇朝赓续存在，部分由于它接受与英国共同统治，不仅维持了和平，而且也吸取了行政管理方面某些优点。

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 19 世纪后期英国非正式的商业帝国一部分（英国在帝国主义列强中居于首位，以它拥有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多一倍的海军力量为标志）。在缅甸或马来亚这样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大国需要以现代公平的征税办法来促进贸易，它可以通过直接的财政管理加以解决。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